

西域、敦煌文献所见回鹘之佛经翻译

杨富学

回鹘与佛教的接触,始自漠北时代。《旧唐书·回纥传》载:

初,有时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

这里的“菩萨”在佛教中是指“觉有情”的仁人。时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618~646年),说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已对回鹘有一定的影响。再如建于公元820年左右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也述及回鹘祖先对佛教的信仰:

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煮,

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①

但佛教在回鹘中的兴盛,则始自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新疆、甘肃诸地以后。汉文史籍对此有着相当明确的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其行记提到这里佛教之盛:

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

居民春月多群聚邀乐于其间。^②

这在敦煌遗书S.6551中也有具体、生动的反映。^③至于河西回鹘信奉佛教的情况,在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回鹘条中也有很有趣的记载:

甘、凉、瓜、沙……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

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

① 录文见罗振玉校补《和林金石录》,辽海杂著本,第19页及羽田亨“唐代回鹘史の研究”,《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1975年,第307页。

② 《宋史·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412页。

③ 王庆菽校录“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60~461页;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36页;李正宇“S.6551讲经文作于西州回鹘国辨证”,《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88~97页;拙作“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待刊)。

敦煌、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焉耆等地石窟中残留的为数丰富的回鹘佛教壁画^①也向人们昭示着昔日回鹘佛徒的虔诚。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疆、敦煌诸地考古、探察工作的展开,湮没数百年之久的回鹘文佛经得以重新面世,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回鹘佛教之流行及佛经翻译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如所周知,回鹘文是中亚操突厥语诸民族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之前使用最广、保留文献最多的一种文字。它源于中亚粟特文。最初用这种粟特文来拼写突厥语的可能是七河流域一带的突骑施部,^②后传入回鹘,以其广泛使用,且影响较大,因称回鹘文。依本世纪50年代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省(Увсаймгийн)图尔根苏木(Тургэнсум)发现的8行回鹘文碑铭^③来看,早在回鹘西迁以前,这种文字就已开始为回鹘(或其它突厥语的部族)人所使用了。回鹘西迁以后,回鹘文始为中亚操突厥语的民族广泛使用,并对周围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有过很大影响。蒙文、满文和锡伯文就是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回鹘文在13~15世纪时也用作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帖木耳汗国的官方文字。在历史上,人们用这种文字翻译、书写了大量的佛教典籍。

就在回鹘文于中亚、新疆及河西走廊盛行之时,来自西亚的伊斯兰教也于10世纪下半叶传入南疆的喀什地区。已完全伊斯兰化的喀喇汗王朝又以这里为跳板,经过长期的“圣战”,到14~15世纪时已差不多完成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征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回鹘文被逐渐弃用,由阿拉伯字母取而代之,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察合台文。长期的“圣战”使西域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丰富的非伊斯兰文献,尤其是回鹘文及其它文字的佛经都遭受了大规模的人为的破坏。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家在对吐鲁番、库车等地古代佛寺遗址进行清理时,常见到无数被撕得粉碎的古代文献浸泡在被屠杀僧侣的血泊中,那些尸骨断头缺足,其状甚惨。经过几百年的漫长岁月,写本、尸骨与泥块混在了一起,并有不少处受到烟薰火燎。^④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高昌故城西北角上一些比较完整的墙壁上残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第43~48页;同氏“库木吐拉的回鹘窟与敦煌壁画”,提交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29页;同氏“沙州回鹘石窟的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1990年,第240~253页;葛露莲著,杨富学译“榆林窟回鹘画像与回鹘萧氏对辽朝佛教艺术的影响”,《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第3~8页。

② 其主要遗物就是中亚与新疆库车、木垒和甘肃河西、天水一带出土的为数不少的突骑施钱币,见渡雅夫“いわゆるチエルギシユの銅銭の銘文について”,《三笠宮殿下還歴紀念オリエント學論集》,东京:講談社,1975年,第322~329页;O. И. Смирнова, Сводный Катлог согдийских Монет, Москва 1981;牛汝极“突骑施钱币考”,《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第36~38页;A. H. 伯林斯坦著,薛宗正译“突骑施钱币的新类型”,《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第98~100页;蒋其祥“新疆、甘肃等地发现的几枚突骑施钱币”,《新疆金融》1988年增刊(二),“钱币专辑”,第24~30页。

③ 策·道尔吉苏隆著,胡斯振译“多罗郭德(долоогодойи)的墓和碑”,胡斯振等译《蒙古历史资料选》,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内部铅印本,1980年,第49~52页;卡哈尔·巴拉提“多罗郭德回鹘文碑的初步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76~78页。

④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London 1928, pp. 61~62(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南京:蒙藏委员会,1934年,第46~47页);L. Sander, *Paläographischer zu der Sanskrithandschrift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Wiesbaden 1968, 13 f.

留的当年被人焚烧的痕迹,它们可能就是当年最后一批回鹘佛教寺院。这些寺院的处所被狂热的伊斯兰教徒放火焚烧后墙倒屋塌,未被烧成灰烬的一小部分残余文献才因被压在下面而幸存至今。此外,在敦煌、哈密、库车诸地还出土有一些保存比较完好的大部头回鹘文佛典,这些都成为我们认识当时高昌回鹘佛教译经事业的主要依据。

近一个世纪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致力于回鹘文佛典的译释与研究,刊布了大批早已失传的回鹘文佛典。这些典籍虽少有完整者,大多都已残缺不全,但由于现今存世的回鹘文文献比较而言还是相当稀少的,所以现知的每一件写本、印本,不管其内容如何、留存状况如何,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前人未知的东西。从现已见刊的文献看,至少有下列佛教典籍被译成了回鹘语文:

(一)法华经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所推崇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曾先后八次被译为汉语,今存比较完整的译本有286年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十卷廿八品;406年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或八卷)廿八品;601年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所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廿七品,其中以罗什本最为流行。依回鹘文本的内容及用词,可以看出它是以罗什本为底本而转译的。

今知属《法华经》的回鹘文写本共有10件,均出自吐鲁番一带,它们分别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5件)、《普贤菩萨劝发品》(2件)、《药王菩萨普门品》(1件)、《陀罗尼品》(1件),另有1件待定。因笔者在它文中已有详述,此不复赘。^①

(二)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现存三种汉文译本:1.西晋竺法护译《八阳神咒经》;2.唐玄奘译《佛说八阳神咒经》;3.唐义净译《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其中法护译本极简略,后二译则有增添,以其内容,学界多疑之为伪经。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时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的时候,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年,邦格、葛玛丽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就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版本,^②以后又发现此经写本89种^③,如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就已达186种之多。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细致的研究后认为,该经掺有波斯的信仰成分。他还认为这诸多写本在年代上可分为三个种类,亦即分属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波斯拜火教的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而波斯的信仰也就逐

① 拙作“从出土文献看《法华经》在新疆、敦煌的传译”,《显密》1995年第1期(试刊号),第25~29页。

② TTT VI, S.9;山田信夫,“ウイグル王國の仏教文化”,《東洋學術研究》18卷1期,1979年,第80~82页(张桐生译载《丝路与佛教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陈世良译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11期,第7页。

③ A. von Gabain, “Texte in Brāhmischrift”,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ADAW Berlin, 1954, S. 71~72; J. Oda, “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Sākiz yükmāk yaruq”, *AoF* 10, 1983, pp. 125~142.

渐被排除。^① 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刊布情况看, 现知的写本有如下述:

1. 大英博物院藏卷: 旧编号为 Ch.0013, 现编号为 Or.8212-104, 为长约 24.9 英尺的卷子形式, 首部残缺, 字体为回鹘文写经体, 共 466 行, 系现存诸写本中保存最完好者。写本似属 10~11 世纪。研究著作主要有:

W. Bang & A. von Gabain &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 SPAW, 1934, S.1~102.

L. Ligeti, "Autour du Säkiz Yükmäk Yaruq",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1971, pp.291~319.

小田寿典“トルコ語本八陽經寫本……”, 第 118~104 页。

2. 日本龙谷大学藏卷: 橘瑞超发现于吐鲁番雅尔湖附近。卷子式, 卷首缺, 残存 405 行。自右向左用墨横书, 佛名朱书。主要研究著作有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陽神咒經”, 《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篇, 言語・宗教篇, 京都, 1975 年, 第 64~137 页, 插图 1~12; TTT VI 之 T₁。

3. 西本愿寺《西域考古图谱》下卷所载残卷, 卷子式, 残存 84 行。主要研究著作有 TTT VI 之 T₂。

4. 日本大谷藏卷: 卷子式, 残存 21 行, 主要研究著作有前揭羽田亨文, 第 139~140 页。

5. 圣彼得堡藏卷: 科罗特科夫(N. N. Krotkov)获于吐鲁番, 卷子式写本, 残存 21 行, 主要研究著作有 W. Radloff, *Kuan-ši-im Pusar*, St. Petersburg 1911, S.93~95; TTT VI 之 P₁。

6. 圣彼得堡藏卷: 卷子式写本, 残存 25 行。主要研究著作有 USp. S. 172f., TTT VI 之 P₃。

7. 圣彼得堡藏卷: 卷子式写本, 残存 15 行。主要研究著作有前揭羽田亨文, 第 138~142 页。

8. 日本龙谷大学藏本: 册子式写本, 残存 6 叶, 主要研究著作有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天地八陽神咒經斷片——龍谷大學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文書 附, 西北科學考查團將來文書”, 《東洋學報》40 卷 4 期, 1958 年, 第 79~97 页。

9. 日本龙谷大学藏残片: 均为极小残片, 近经小田寿典研究, 辨识出其中的 14 件断片:

小田寿典“龍谷大學圖書館藏ウイグル文八陽經の斷片拾遺”, 護雅夫(編)《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 東京: 山川出版社, 1983 年, 第 161~184 页。

——“ウイグル文八陽經‘大谷氏所藏斷片’追考”, 《豊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1, 1984 年, 第 91~100 页。

——“龍谷大學圖書館藏ウイグル文八陽經の版本斷片”, 《豊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4, 1987 年, 第 25~38 页。

^① 小田寿典, “トルコ語本八陽經寫本の系譜と宗教思想的問題”, 《東方學》第 55 輯, 1978 年, 第 118~104 页。

——“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Säkiz yükmäk yaruq”, AoF 10, 1983, pp. 125 ~ 142; ibid, “Remarks on the Indic ‘Lehngut’ of the Säkiz yükmäk yaruq sūtra”, K. Röhrborn, et al. (eds.), *Sprachen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 Wiesbaden 1983, S. 65 ~ 72.

——“Uighur Fragments of the Block-Printed Text, 《Sakiz Törlügin yarumimiš Yaltrimiš Nom Bitig》”, TDED XXIV ~ XXV, 1980 ~ 1986, pp. 325 ~ 347.

10. 东京中村不折藏本:均为残片,系回鹘文《八阳经》残卷之一种。^①

11. 日本龙谷大学藏本:刻本,残存1叶,存8行,编号为 Ot. Ry. 1539 ~ 1544。见于羽田明、山田信夫“大谷探險隊將來ウイグル字資料目録”,《西域文化研究》IV,京都:法藏馆,1961年,第79页,图版16 ~ 18。

12. 北京藏本: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获自吐鲁番一带,经折装,刻本,残存三张七面半,有文字25行。原件发表于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专刊》丁种第5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112 ~ 113页;主要研究著作有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83 ~ 192页(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5 ~ 561页;《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3 ~ 444页)。

13. 圣彼得堡藏本:刻本,经折装,残存40行,主要研究著作有 W. Radloff, *Altugurische Sprachproben aus Turfan (Nachrichta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 Akad. der Wiss.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Heft I)*, 1899, S. 68 ~ 69 及 TTT VI 之 P₂、P₄。

14. 乌鲁木齐藏本,写本,贝叶式,一叶,双面书写。正面存文字13行,背面1行,近由卡哈尔·巴拉提刊布(Kahar Barat, “šingqo šäli tutung Traducteur du Säkiz Yükmäk Yaruq nom”, JA t. CCLXXVIII, 1990, pp. 155 ~ 166)。

上述写本总数计达186种,然无一完本,仅第1、3种较为完好,各存有400余行,但将其拼接于一起,差不多可得完本(羽田亨文,第68页)。译本大致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较忠实于汉文本,如敦煌所出的本子;第二个系统则有较多更改,并增加有新内容,今见刊的本子大都属于这一系统,惟橘瑞超于雅尔湖所发现者具有从第一种向第二种过渡的特征(前揭小田寿典“トルコ語本八陽經寫本……”)。译经之时代多认为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不久,但抄写与刻印的时间跨度较大。如敦煌本,就正字法特点看,似属10 ~ 11世纪之遗物。而北京本在第一、二大张所绘“如来说教图”的下面标有“陈宁刊”三字。陈宁其人在元刊《磻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处均可见到。据考,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应在元代中叶。^② 推而论之,北京藏《八阳经》的刊刻亦应在此时,刻版地点是在杭州。可见此经流行的时间不短。

① 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語文書斷片の研究”,《東洋學報》第62卷,1 ~ 2号,1979年,第02 ~ 010页。

② 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8 ~ 130页。

(三) 金光明最胜王经

回鹘文原题为: Altun önglög yaruq yaltriqliv qopta kötrül-miš nom iligi atliv nom bitig. 该经有二种写本。其一由德国勒柯克(A. von Le Coq)于1908年发现于吐鲁番, 约残存10叶, 木刻本, 现藏柏林。另一种由俄国的马洛夫(S. E. Malov)于1910年发现于甘肃酒泉文殊沟, 共397叶, 存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该写本中散失的二叶为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于1927~1935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于甘肃某地所得, 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写本纸质粗厚, 呈黄褐色, 保存良好。写本宽60.5厘米, 高23厘米, 每面平均写22~25行。以回鹘文写经体书写, 清晰易读。此抄本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抄经人为 Bilgä Talui Šabi、Ratna Vijra Šabi、Čax Capat Monggal Toyin 等, 抄经地点为敦煌。

此外, 在吐鲁番博物馆也收藏有回鹘文《金光明经》写卷, 系买买提·哈吉(Memet Haji)于柏孜柯里克石窟所发现, 但尚未刊布。

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的翻译时代, 学术界众说纷纭。俄国的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书译于13~14世纪, 同时承认该书的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①而德国的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自10世纪,^②学界多倾向此说。此经的跋尾明确地记载了它的翻译过程:^③

y(ä) mā qutluv öngdün uluv tabvač ilinčä tayšing siwšing alvu šasatarlariv nomlariv qalisiz ötkürmiš bodisataw gitso samtso atliv ašari ānātkāt tilintintawvaš tilinčä āwirmištā yana bu biš čöbik kalyük bulvanyuq yawaz ötdä qoluta kinki boş-vutluv biš-balıqliv singqu sāli tutung tawvač tilintin türk uyvur tilinčä ikiläyü āwirmiš altun önglög yaruq yaltriqliv qopta kötrulmiš nom iligi atliv nom bitig bitiyü oquyu yätildi sadu ädgü ymā qutluv bolz-un!

时幸福的东方之伟大的桃花石国(即中国——引者)中洞彻大乘[与]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从印度语译为汉语。时此五浊恶世之中别失八里后学胜光法师都统(Singqu Sāli Tutung)又从汉语译为突厥一回鹘语, 定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 写讫。善哉! 善哉! 祝福!

此跋告诉我们, 回鹘文《金光明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④依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而转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写本第一卷中尚包括不见于汉文本的两个

① В. В. Радлов и С. Е. Малов, *Suvarṇa-prabhāsa* (СУВ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ции (= Bibliotheca Buddhica XXVIII), СПб, 1913~17, стр. 14~15.

② Peter Zieme, "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сутры «золотой блеск»", *Turcologica*, Л., 1976, стр. 341.

③ F. W. K. Müller, *Uigurica*, APAW, Berlin 1908, Nr. 2, S. 13~14.

④ 以前学界多译作“僧古萨里”或“译古萨里”。后来, 哈蔡在一份回鹘文本刻本中发现一位以汉一回鹘双语书写的大译师的名字, 其确切写法为 ŠYNKQW S'LY Tutung, 而在每页的汉文注码上都标有“胜光法师”字样, 显然, 二者是相通的(Georg Hazai, "Fragmente eines uigurischen Blockdruck-Faltbuches", AoF 3, 1975, S. 91 Seq., pl. 9, 11, 13, 15, 17). Cf. A. von Gabain, *Die Druke der Turfan-Sammlung*, SDAW, 1976, nr. 1, p. 19 und pl. 9.

故事:张居道因抄写《金光明经》而得起死回生和某妇人以诵该经而得除病,以其内容,当系胜光法师由《忏悔灭罪传》(P. 2099 等)译补。此外还多出了《四天王赞(Tanwasin Ačari)》(译自藏语)、《八大圣地制多赞(Amoga Širi Ačari)》(译自梵语)和书末的回向文(当为抄经者所撰)。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都为残篇断简(特别是新疆出土者尤甚),仅有此写本与敦煌本回鹘文《俱舍论实义疏》、三十年代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玄奘传》和 1959 年哈密出土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部头大且比较完整,故显得特别重要,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突厥学家们从事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先后对其进行研究的主要著作有:

1908 年,缪勒(F. W. K. Müller)发表《回鹘文献汇编(Uigurica)》I, 据德国藏本研究了第一、十六、十七等品中的部分内容。

1913~1917 年,拉德洛夫和马洛夫在前揭著作中将文殊沟写本全部铅排发表。

1930 年,邦格(W. Bang)和葛玛丽(A. von Gabain)在“回鹘研究(Uigurische Studien)”(UJb Vol. X, S. 193~210)中译释了第三卷第五品中之一部分。同年,拉德洛夫又将回鹘文本德译出版。

1941 年,葛玛丽在其《古代突厥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一书后附文选中研究了第十卷第廿六品中的舍身饲虎故事。

1945 年,恰合台(S. Cagatay)在《金光明经中的两个故事研究(Altun Yaruktan ikiparca)》中探讨了舍身饲虎与张居道的故事。

1951 年,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менности)》一书也收录了上述两个故事。

1961 年,特肯撰文研究了第二卷第三品(S. Tekin, “Über die buddhistische Trinitätslehre in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utra”, UAJ 33, 1961, S. 187~192)。

1962 年,護雅夫发表“ウイグル語訳金光明最勝王經”(《史學雜誌》71 卷 9 期,第 66~81 页)。

1966 年,特肯撰文研究了该经书末的回向文(“Buyan evirmek (sevâbin tevcihi)”, *Resid Rahmeti Arat için*, Ankara 1966, S. 390~411)。

1971 年,特肯在 1958 年所撰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第九、十品作了很细致的研究(*Die Kapitel über die bewußtseinslehre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IX und X)*, Bearbeitet von K. Röhrborn und P. Schulz, Wiesbaden 1971)。

1976 年,茨默研究了第一卷第二品中的比喻(前揭“О Вропой……”, стр. 341~347),并著文介绍了胜光法师之译经业绩(“Singqu Sāli tutung – 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 ins Uigurische”, *Tractata Altaica*, Wiesbaden, S. 767~775, -2 pls.),第二年,该氏又研究了柏林本序品中张居道的故事(“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I, 1977, pp. 149~156; *ibid*, Addenda zu TUBA I (1977),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II, 1978, pp. 168~169)。

1978 年,耿世民发表“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载《图书评介》1978 年第 2 期)。

1979年,毛埃与洛贝林合作研究了卷一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Caityastotra)》(D. Maue und K. Röhrborn, "Ein Caityastotra aus dem alttürkischen Goldglanz-Sūtra", ZDMG 129, 1979, S. 282~320)。

1980年,耿世民撰成“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油印稿16页)。

1982年,百濟康義和洛贝林合刊了斯德哥尔摩收藏的2叶《金光明经》写卷(K. Kudara und K. Röhrborn, "Zwei verirrte Blätter des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im Ethnografiska Museum, Stockholm", ZDMG 132, 1982, pp.336~347)。

1984年,哈密顿撰文探讨了胜光法师的称号问题(J. Hamilton, "Les titres šāli et tutung en ouïgour", JA 272-3/4, 1984, pp.425~437)。

1986年,耿世民发表“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

1987年,李经纬发表“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60页)。

1988年至1990年间,张铁山分别发表了他对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七、八品的研究(分别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68~76页;1988年第5期,第55~65、48页;《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97~109页)。

1995年,周北川发表了该经第七卷第十四品(《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5~90页)。

(四)玄奘传

回鹘文写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原题作 bodistw taito samtso ačari-ning yoriw- in uqitmap atliv tsī in čuīn tigma kwi nom bitig。现知写本共有三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于1930年或稍前出自南疆(实际出土地很可能在吐鲁番或吉木萨尔)。惜在落入一商人之手后被拆散出售,一部分由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于1930年购于新疆,转售予北京图书馆,凡242叶;一部分为海金(Joseph Hakin)1932年参加锡春考察队自叙利亚赴北京途中购得,仅有8叶;还有一部分经伯希和介绍,由商人售给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约123叶;此外,很大一部分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过去长期不为人知。1971年,吐谷舍娃与孟列夫合撰《回鹘文玄奘传》,附有不甚清晰的照片7叶,属原书卷十。^①1980年,吐谷舍娃《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一书出版,研究了写本第五卷之最后部分。^②1991年,同氏又发表了《回鹘文玄奘传》一书,^③研究了《玄奘传》之第五、六、八、十诸卷之内容。

① Л. Ю. Тугушева, Лев Н. Меньщиков, "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Фрагменты из гл. х)"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Москва 1971, М. 1974, стр. 253 ~ 296 и Факс. 556 ~ 569.

② Л. Ю. 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③ Л. Ю. Тугушева,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91.

从近年发表的资料看,柏林也藏有《玄奘传》写本残片,已知的有二件,属于别本。^①

关于此写本之出土地点、时间等问题,由于寻宝人及商人有意隐晦、割裂,使之若明若暗。1932年,葛玛丽于海金处借得8叶进行研究,不久她又遇到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知该馆所藏系袁复礼于新疆购获,此后经调查知,吉美博物馆所藏系购自吐鲁番一商人之手,而袁复礼也曾在吐鲁番小住,她认为袁氏亦应在此地购得,时间皆在1932年。1951年冯家昇整理北京图书馆所藏残卷时曾函询袁复礼,回信云系1930年在迪化所得。^②可见,其出土时间当距此时不远。

写本为梵夹式,长43厘米,宽18厘米,四边刻划有红框线。纸呈黄褐色,麻质,双面书写,每面27行。在每叶的第5至9行之间有圆圈,直径约4.9厘米。圆圈中间有绳孔,每叶左边用小字回鹘文注明叶码,现多残损。

回鹘文《玄奘传》的译者同《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者一样,同为胜光法师,这在北京藏本23叶背面16~26行(卷七末)的题跋中有所记载:

ymä qutluṣ öngtün uluṣ tvrač ilinča taising siosing alqu šastr larıṣ qamay
nomlarıṣ qalisız ötgürü topolu bilmiş boşunmiş bodistv kitsi samtso atlı ačarı o o
änätkäk tilintin tvrač avirmiş yana bu kalyük bulṣanyuq biš čöbik y(a)vlaq ödtäki
kinki boşutluṣ biš balıṣ-lıṣ singqu säli tutung tvrač tilintin ikiläyü türk tilinča
aqtarmış

时幸福的、伟大的桃花石国中有慧立大师者,洞澈三藏,受教著为桃花石文,
名叫彦惊法师者扩展之,又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都统再由桃花石文译为突厥
文。^③

如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于10世纪之说成立,那就说明此写本也当译成于10世纪左右。耿世民先生认为:“根据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字体(为一种早期的回鹘文写经体)以及写本中绝不见元代回鹘文文献中常见的t和d、s和z字母替换使用的情况,认为该书翻译的年代应在元代以前,即9~12世纪之间。”^④

北京图书馆所藏,冯家昇先生仅整理了一部分,其中袁氏所得1~158叶分属卷三、七、九、十,而159~242叶则尚未整理。海金所得8叶属第九卷。这些在1932年均由葛玛丽借去,至1946年始得归还。她著成“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信”,研究了袁氏所得卷七中的三封信函,凡7叶半(第16~23叶),397行。^⑤1951年,冯家昇应邀整理葛玛丽归还北

① K. Kudara und P. Zieme, “Fragmente zweier unbekannter Handschriften der uigur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AoF 11, 1984, S. 136~148.

②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373~375页。

③ 同上,第378~379页;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50页。

④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及其译者胜光法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第67页。

⑤ A. von Gabain, “Briefe der Uigurischen Hüen-tsang-Biographie”, SPAW, 1938, XXIX, S. 1~47 (371~415).

京图书馆的有关写本,因工作量大,先将其全部影印于1951年出版。^①冯氏研究报告于1953年出版,并就译本之发现、译者与译年、玄奘卒年与回鹘历法等问题进行研究,但未对写本本身进行转写、翻译。1957年,耿世民先生对写本第七卷开首四叶进行了研究,撰写了“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但直到1979年以后才得发表。^②最近,卡哈尔·巴拉提又研究了该写本的第三卷。^③吉美博物馆所藏已有少部分业经葛玛丽作了研究,有6叶内容属第五卷,共324行。^④后来,托尔斯太又整理发表了其中属第四卷的写本。^⑤此外,尚有大批的有关写本未经整理,情况不明。以上述研究为基础,铁兹江出版了第十卷比较完整的辑本。^⑥

回鹘文《玄奘传》虽为译本,但由于其篇幅较大,字体清晰,保存比较完好,对回鹘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它涉及到的中亚、印度地名、民族名称的对音,对历史学、地理学的研究也极具积极意义,^⑦故一直深受各国有关学者的关注。

(五)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又译《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回鹘文原名作 maitrisimit,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之一。它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序文的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教义和以施主曲·塔什·依干(Qü Taš Ygän)名义书写的回向文;正文主要描绘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Vaibhasika)的重要经典。

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勒柯克(A. von Le Coq)率领下,于吐鲁番的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均藏德国。据葛玛丽之研究,共有6种写本,其中两种为“胜金本”,两种为“木头沟本”,另外两种出土地则尚未查明。1957年,葛玛丽将收藏于梅因茨(Mainz)科学院的该著残卷(113叶)影印刊布,定名为《弥勒会见记 I (Maitrisimit I)》;1959年,她又在柏林科学院发现了一批残卷(114叶),1961年影印发表,定名为《弥勒会见记 II (Maitrisimit II)》。1980年,德国所藏的《弥勒会见记》写本又

① 《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考古学专刊丙种第1号,北京,1951年,附有王重民一季羨林跋。

②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49~262页;同氏“回鹘文玄奘传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民族研究)第三辑,1980年,第267~304页;同氏“Die uigurische Xuan-Zang Biographie, ein Beitrag zum 7. Kapitel”,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Vol. 19, 1986, pp. 253~277.

③ Kahar Barat, “The Uighur Xuanzang biography. Volume II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16, 1992, pp. 5~65.

④ A. 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APAW, 1935, VI, S. 3~32(151~180).

⑤ J. P. C. Toalster, *Die uigurisch Xuan-zang-Biographie. 4. Kapitel mit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Gießen 1977.

⑥ S. Tezcan, *Eski uygurca Hsüan Tsang Biyografisi*. Ankara 1975.

⑦ 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9~32页。

由特肯作了系统整理后附以转写与德译出版。^①

1959年4月,哈密县天山公社脱米尔提大队巴什托拉的维吾尔牧民牙合亚热衣木在放牧时于一石堆内的毡包中发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586叶(其中完好无缺或大体完好者约114叶),每叶大小为47.5×21.7厘米,纸为褐黄色,纸质厚硬,每叶上下左右均留有相等的空白。文字用黑墨从左至右竖写,每面书有30或31行工整美观的回鹘文字。有些幕前面用朱笔标明演出地点,每叶左侧都以黑色小字回鹘文注明叶数。每叶第7至第9行中间用浓墨细线画有直径为4.6厘米的小圆,圆心留有直径为0.5厘米的绳孔。

关于这部作品的名称和作者、译者的名字,在写本的第一、三、十、十二、十六、廿、廿三、廿五诸幕末尾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跋文。例如第一幕末尾(第16叶背面)这样写道:^②

23. ……alqu šasatar nomlarav
24. adartlayu uqtači waypaš šasatarlav noš sawsus
25. içmiš aryač(a)ntri bodiswt kši açari anātkak
26. tilintin tohri tilinča yaratmış patanraksit
27. kranwaž-iki türk tilinča awirmiş maitrisimit
28. {nom bitig}dā badari b(a)raman-ning yaviš yavımaq
29. [atlir baštinqi] ülüş tükädi

精通一切经论的、饮过毗婆娑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改编为吐火罗语、智护法师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跋多利婆罗门做布施第一幕完。

据此跋文可知,该经回鹘文原名作 maitrisimit,它先由圣月大师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大师据之转译为突厥语。据考,圣月大师系三唆里迷国(äc solmi,即焉耆)的著名佛教大师(耿氏上引文),而智护呢?葛玛丽据存于德国的此书写本称其为 Il-baliq 人,认为他出生于伊犁地区。^③而哈密顿则认为 Il/El-baliq 为“国都”之意,可能指回鹘王国的国都——高昌。^④

关于此回鹘文译本成书的年代,学界也莫衷一是。葛玛丽认为德国写本(胜金口出土)抄于9世纪,译成年代应在此前;^⑤哈密顿则根据德藏写本与敦煌所出早期回鹘写本的相似性,认为其应属10世纪。^⑥冯家昇先生认为,“译经的年代不应早于840年回鹘人西迁之前,也不能晚到11世纪以后”,“至于11世纪以后则又太晚,可能那时候当地人经

① S. Tekin,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s der buddhistischen Baibhasika-schule*, I – II, Berlin 1980.

②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1年,第214页(收入《中国突厥语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5页);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59页;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I,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

③ 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I, Beiheft 1957, S. 20.

④ J. Hamilton, “Review of A. von Gabain, *Maitrisimit*”, TP Vol. 46, 1958, p. 443.

⑤ *Maitrisimit* I, S. 27.

⑥ J. Hamilton, “Review …”, p. 442.

二、三百年之久,已被回鹘融合而不通吐火罗语了。”^① 土耳其学者特肯则提出,此书当成书于8世纪;^② 此说得到了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的支持,耿世民指出其成书时间应在8~9世纪之间。

由于该经的大部分现存我国,故成为国内回鹘语文界研究的热点,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尤以耿世民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自1980年来,他相继发表了十余篇专论,除上文已提到者外,尚有以下诸文:

Geng Shimin, “Qadimqi Uygurca Iptidayi Drama Piyesasi Maitrisimit (Hami Mushasi) ning 2-Purdasi haqqidiki Tatqiqat”,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4, 1980, pp.101~156, pl.m.

耿世民“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年,第129~157页。

Geng Shimin & H.-J. Klimkeit. “Das 16.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9, 1985, pp.71~132, pl.m.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In Zusammenarbeit mit H. Eimer und J. P. Laut hrsg. 2 Bde, Wiesbaden 1987 (Asiatische Forschungen 84).

Geng Shimin, H.-J. Klimkeit und J. P. Laut, “Der Herabstieg des Bodhisattva Maitreya vom Tusita-Götterland zur Erde. Das 10.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AoF* 14, 1987, S.350~376, Tafel XVI~XXIII.

——“Das Erscheinen des Bodhisattva. Das 11.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AoF* 15, 1988, S.315~386, Tafel II~XIV.

——“Die Weltflucht des Bodhisattva. Das 13.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AoF* 18, 1991, S.264~296, Tafel VI~XV.

——“Das Erlangen der unvergleichlichen Buddhawürde. Das 15. 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AoF* 20, 1993, S.182~234, Tafel I~XIII.

——“Nachtrag zum Erlangen der unvergleichlichen Buddha-würde”, *AoF* 20, 1993, S.369~390, Tafel I~VIII.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收入《民族史论文选1951—1983》(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上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80~200页)。

此外,李经纬、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克尤木·霍加和季羨林的研究成果也很重要,现列数其成果如下:

李经纬“《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7~56、76页。

① 冯家昇“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

② S. Tekin, “Zur Frage der Datierung des Uigurischen Maitrisimit”, *Mitteilungen der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6, 1970, S.132

-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73～704页，图2。
-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
-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 “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文译名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第28～46页。
-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211页，图1。
- 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克尤木·霍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研究”，《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2年第1期，第56～85页。
-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章简介”，《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97～112页。
-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2年第4期，第84～150页。
-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第50～64页，图1。
- “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新疆艺术》（维文版）1984年第4期，第56～66页；1984年第5期，第30～47页。
- 多鲁坤·阙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曲六乙、李肖冰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19页。
- 多鲁坤·阙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第30～36页。
- 多鲁坤·阙白尔、克尤木·霍加、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新疆文物》（维文版）1985年第1期，第28～96页。
- 季羨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第6～19页。
-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64～70页。
- 张龙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第44～47页。

（六）佛说无量寿经

敦煌写本 Or. 8212—121（旧编号为 Ch. 00288）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原卷长 28 厘米，高 21 厘米，存文字 39 行，字体工整，但残损严重。从现存内容看，可能系净土三部经之一《佛说无量寿经》之改译本，内容与《大正藏》第 12 册第 265 页中的一节内容近似。译者不详，属 9～11 世纪之遗物。1986 年，哈密顿博士率先刊布了这一写本^①，依其刊本为

^①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I, Paris 1986, no. 2, pp. 21～26; Tome II, Paris 1986, pl. 271～272.

据,杨富学、牛汝极亦对其作了译释。^①

关于该经的另一回鹘文本刻本亦于1980年发现于柏孜柯里克石窟,存3叶,编号为80.T.B.I:596,纸幅28×10厘米,夹有梵文,说明该经有可能译自梵文。^②

(七)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梵文作 Amitāyurdhyānasūtra,亦为净土三部经之一,有南朝璁良耶舍译本一卷。日本所藏回鹘文译本仅为一片残片,双面书写,共52行,由橘瑞超发现于吐鲁番一带(?),1912年刊于《二樂叢書》第1號,后由百濟氏进行了重新整理,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回鹘文译本译自汉文。^③另有二叶写本藏于柏林,经茨默辨识,^④与橘瑞超所发现的那叶属同一写本,后与百濟氏合作发表。^⑤

(八)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同为净土三部经之一,今北京图书馆藏有25叶,均未刊布。^⑥柏林亦有收藏,已由茨默刊布。^⑦日本所藏也由春日井真也作了报道。^⑧

(九)善恶两王子的故事

关于这一内容的写本今发现者有三件,其中以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P. chinois 3509 比较完整。该写本为一册子卷,由二十张长方形对折的文书组成,用一根皮条装订,共40叶80面。每面有回鹘文7~8行,其边缘有许多都已残损。最宽处为11×14厘米。文献纸为褐色,厚且粗糙,字体为回鹘文行书。

最早刊布 P. 3509 号写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者是于阿尔,撰有“用突厥语回鹘文字写成的两兄弟的佛教故事”。^⑨在此稍后,伯希和于同年(1914年)5月在《通报》上也发表了这件文书,题作“善恶两王子故事的回鹘文本”。从该写本的内容看,与汉文《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恶友品》^⑩最为接近。应该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回鹘文本沿用的为汉文本《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线索,但并非简单地直译。据研究,其内容在许多细节上

①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9~133页。

② 多鲁坤·阔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神户,1988年,第80~81页;同氏“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年第1期,第74~76页。

③ 百濟康義“觀無量壽經——ウイグル訳断片修訂”,《仏教学研究》第35期,1979年,第33~36页。

④ P. Zieme, “A New Fragment of the Uigur Guanwuliangshoujing”, 《龍谷大學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0號,1982年,第20~29页。

⑤ 百濟康義, ツイーメ, ベーター《ウイグル語の觀無量壽經》, 京都:永田文昌堂, 1985年。

⑥ 前掲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 第187页。

⑦ P. Zieme, “Uigurische Sukhāvativyūba”, AoF 12, 1985, S. 129~149.

⑧ 春日井真也“ウイグル文阿彌陀經について”, 《仏教文化研究》第4號, 1954年, 第106页。

⑨ Cl. Huart, “Le Conte bouddhique des deux freres langue turque et en Caractères Ouïgours”, JA, 1914, pp. 5~57.

⑩ 《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156号,第142~148页。

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汉文本中有善友太子为救穷苦百姓,求国王开国库,“以五百大象负载珍宝”,在回鹘文本中却没有提及大象一事;汉文本中记载,当恶友刺瞎善友双目夺宝而去时,有一树神告诉了善友是谁刺瞎了他的双目,在回鹘文中说是一仙人(回鹘语作 risi,梵文作 risi)告诉了他真相;在汉文本中是果园主告诉善友如何看守果园不让飞禽啄食,如在树上挂铃系绳,绳头握在太子手中,在回鹘文本中却是善友太子告诉果园主如何看守果园等。这大概说明了回鹘文本的翻译者对其它各种说法也略有了解,或者是历代抄经师改动的内容。其实,在汉文佛经中有一批关于同一类型内容的故事,它们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恶友品》一节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异。如《贤愚经》所收的故事中有两则之许多内容都与《恶友品》相同,即《善事太子入海》^①和《大施抒海》^②。于阿尔、伯希和在刊布回鹘文本时主要是掌握了《贤愚经》中的这两种文本和另外一种载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十五卷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③,以及它们的译本。

此外,土耳其学者奥尔昆还根据伯希和刊本出版了土耳其文本。后来,哈密顿对这个回鹘文本进行了重新研究,并指出了前人的许多错误,撰成《敦煌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④以此为据,最近又由牛汝极对其进行了译释。^⑤

哈密顿在其著作之后还附有一件出自敦煌莫高窟的回鹘文残片(共2面,22行)。^⑥此残片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编号为 Or. 8212-118,原编号为 Ch.00291。哈密顿认为,“它肯定是有关两兄弟故事的 P.3509 号之外的写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虽然这一叶是与 P.3509 号写本出自同一石窟,但它无论由于其较大的开本(20×16 厘米),还是由于其字体(更美观、更规范)都与 P.3509 写本不同”。

除此之外,茨默还在柏林的吐鲁番收集品中找到了一件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残卷(编号为 T II Y.1)。^⑦

(十)阿烂弥王本生故事

关于这一内容的写本仅有一件,现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 P.ouigour 1。原卷分为三叶,第一叶长 26 厘米,高 42 厘米,正背二面各分上下二栏。正面下栏书写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17 行,上栏书题记 13 行;背面上栏书《阿烂弥王本生故事》17 行,下栏书题记 15 行。

第二叶长 26 厘米,高 22 厘米,正面书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17 行,背面 16 行。

第三叶长 26 厘米,高 22 厘米,正面书回鹘文题记 16 行,背面书 8 行。

三叶共有文字 119 行,其中 67 行为佛经《阿烂弥王本生故事》(Aranemi-Jātaka)。此

① 《贤愚经》第 9 卷,《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 册,202 号,第 410~415 页。

② 《贤愚经》第 8 卷,《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 册,202 号,第 404~409 页。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第 178~180 页。

④ J. 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ïgour, Manuscrits ouïgours de Touen-houang*, Paris 1971.

⑤ 牛汝极“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研究”,《新疆文物》1991 年第 1 期,第 111~130 页。

⑥ J. 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pp. 53~56, 203~204.

⑦ P. Zieme, “Ein Uigurische Turfanfragmente der Erzählung vom guten und bösen Prinzen”, AOH 28, 1974, S. 263~268.

经在现存的汉、梵文本中未见其原本(《藏文大藏经》不详),从译文中用词多采用吐火罗语词汇来看,该经当译自吐火罗文。此经的发现,可补汉文大藏经之阙。此外,该文书中出现的长达 52 行的回鹘文题记也很重要。根据题记,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该经的施主是僧慈·阿闍梨(Singsi Ačari),抄写者是阿尔甫·通迦(Alp Tonga),而且还可以看到施主与抄经者的度己度人的宗教思想。在古代维吾尔族佛教史研究中,该写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该写本最早由哈密顿刊布,^①以其刊本为依据,杨富学对其作了新的研究,重点探讨了写本的时代与学术价值。^②

(十一)吐蕃文突厥语《佛教教理问答》

原卷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 P. chinois 5542/P. tibétain 1292,为用藏文行书无头字体(但带有吐蕃王朝时期的特点,如反写元音 i 等)拼写古代突厥语的佛教文献,共 44 行。残卷长 42~43 厘米,宽 29.5~30 厘米,纸呈灰褐色。首尾为三归依文句,中间用问答形式阐述“四生”、“五道”、“三毒”、“十戒”、“六波罗蜜”等佛教基本教义。本残卷为现存同类文献残卷中较为完整的一件,对研究突厥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著作有:

P. Pelliot, “un catéchisme bouddhique ouïgour en écriture tibétaine”, JA 1921, juil. ~ sept., pp. 135~136.

A. Spanien et Y. Imad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I, Paris 1979, pl. 608 & Notes du Tome II, p. 32.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文字ご書かおたウイグル文仏教教理問答(P. t. 1292)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XXV 卷,1985 年,第 1~85 页。

D. Maue und K. Röhrborn, “Ein Buddhistischer Katachismus’ in alttürkischer sprache und tibetischer Schrift”(I - II), ZDMG 134 - 2, 1984, S. 286~313; 135 - 1, 1985, S. 69~91.

(十二)华严经

《华严经》,梵文作 Buddhāvataṃsakamahā-vaipulyasūtra。今梵本已不全,仅有汉文本、藏文本传世。汉文本共三译:一为所谓的六十华严,系东晋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于 418~420 年译出;二为八十华严,唐代于闐实叉难陀(Śikṣānanda)于 695~699 年译出;三为四十华严(为前二本最后《八法界品》的单译),由唐代般若(Prajñā)于 795~798 年译出。

在回鹘文本中,《华严经》写作 uluv buluṅ yīṇaq sayuqī ārtiṅā kiṅ alqīx burxanlar-niṅ

^①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 - 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I, Paris 1986, no. 1, pp. 1~26; Tome II, pl. 268~270.

^② 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闍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89~101 页。

linxua čačak üzäki itigi yarativı, 译本今知者有二种, 一为四十华严, 一为八十华严, 其中属前者的回鹘文残卷早已为国际学界所熟知。1911 年俄国拉德洛夫发表了沙俄乌鲁木齐领事迪雅科夫(A. A. Dyakov)于吐鲁番发现的“不知名”回鹘文佛经 2 叶 84 行,^① 后经研究、辨识, 知为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② 1953 年, 日本学者羽田亨又研究刊布了 1911~1914 年日本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的内容属四十华严第三十三卷的 5 叶半回鹘文残卷。^③ 其中最后一叶自第 4 行以后为一译跋:

ariv bögä tigin y(a)rlıvınga k(ä)ntü(?) dintarı kinki boşrutluy biş baliq
arasang (atsang?) [ba]qşı tutung t(a)vraç tilintin türk tilinčä ikiläyü äirmiş

根据 Ariv Bögä 亲王之令, Arasang(Atsang?) 博士都统, 别失八里的一位和
尚与学者, 将它从汉文译成突厥文。

这里的 Ariv Bögä 亲王实际上即为 1260~1264 年间与忽必烈争位之阿里不哥, Arasang(Atsang?) 实应作 Antsang, 即元代畏兀儿大翻译家安藏,^④ 说明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1965 年, 土耳其突厥学家阿拉特发表《古代突厥诗歌》一书, 其中第 9、13、16 等篇为押头韵的佛教诗歌, 分别出自四十华严之三十九、四十诸卷。^⑤ 接着, 茨默博士又发表了柏林藏木刻本四十华严尾部普贤行愿赞的 12 行跋文, 知其刻印于 1248 年, 他还发现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尚存有其它四十华严残卷。^⑥

现知属于八十华严的回鹘文写本不多。日本羽田明处藏有 9 叶残卷照片, 但原件不知去向, 内容相当于汉文本之卷三十六、三十八、四十等。^⑦ 有幸的是, 属于该译本的回鹘文残卷在国内已发现有 3 张, 其中有 2 张现藏兰州甘肃省博物馆, 编号为 10562, 据称出自莫高窟。原件为两大张(8 面)回鹘文本刻本, 残高 34.7 厘米, 长 45 厘米, 折叠式, 每面书 13 行文字。第一张属八十华严卷十四,^⑧ 第二张属该经卷二十二。^⑨

① W. Radloff, *Kuan-ši-im Pusar. Eine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 Kapitels der chinesischen Ausgabe des Saddharmapundarika*. St. Petersburg 1911, стр. 103~109.

② 石濱純太郎“回鹘文普賢行願品殘卷”,《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50 年,第 63~73 页。

③ 羽田亨“トルコ文華嚴經斷簡”,《關西大學東洋學術研究所論叢 6 石濱先生還歷記念論文集》I,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53 年,第 1~29 页,附圖 1(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 年,第 183~205 页,图版四)。

④ Moriyasu Takao,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RDTB, No. 40, 1982, p. 10. (杨富学、黄建华汉译载《敦煌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43 页)。另参见 Juten Oda, “On the Uigur colophon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sūtra in Forty-Volume”,《豐橋短期大學研究紀要》第 2 期,1985 年,第 121~127 页。

⑤ R. R.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 S. 68~79, 126~130, 162~171.

⑥ Peter Zieme, “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apranidhana”, *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ta*, 1982, S. 601~604.

⑦ 百濟康義、小田寿典“ウイグル訳八十華嚴斷簡”,《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22 集,1983 年,第 176~205 页。

⑧ 耿世民“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68~77 页。

⑨ 耿世民“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第 84~89 页。

第三张现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为一大张(4面)回鹘文本刻本,亦属《八十华严》卷十四,高35厘米,长42厘米,折叠式,每面书13行文字,同兰州所藏一样,纸质厚硬,呈黄褐色,四边框有红线,似为元代刻本。依各种特征看,这3张刻本残卷实属同一刊本。^①但译者不详,有人认为可能亦为安藏所译,但笔者不以为然。在历史上,由一人译某部经之多种版本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十三)阿毗达磨俱舍论

《阿毗达磨俱舍论》为印度佛教大师世亲(Vasubandhu)所著,现存有梵、汉、藏三种文本,汉语有二译:一为真谛译本,题作《阿毗达磨俱舍释论》(22卷,译于564年);一为玄奘所译《阿毗达磨俱舍论》(30卷,译于651年),回鹘文本译自玄奘的三十卷本,译者不详。从回鹘文译文看,译者具有很高的汉文水平,精通佛学,且懂梵文,这从其译文中将许多佛教术语都正确地还原为梵文这一点上即可看得出来。译成时代约在14世纪初到中期。

关于这一文献的写本,就目前所知,仅有一件,但散藏于瑞典、日本和国内各收藏单位。瑞典所藏,共16叶,分属该经第七、八、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廿二、廿三、廿九、三十等卷,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系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成员贝格曼于甘肃所得。后由百济康义辨识并做了多方面研究。^②另一叶藏日本京都有邻馆,系经李盛铎介绍购入,亦由百济氏刊布,属第三卷^③。属于同一写本第八卷的一叶见存兰州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10561,近年已由耿世民先生首次刊布、研究。^④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回鹘文残卷从字体与用词特点看,似亦属同一写本。但由于残损过甚,未能复原。^⑤

此外,在日本天理图书馆还收藏有4叶汉文《俱舍论》残卷,以其纸型与用笔等因素,张大千和百济康义都认定这些写本必为回鹘人所书。^⑥最近,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属于同一写本的一叶残卷也得到了刊布。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文献是1928年以前苗希甫(东北某县县长)赴西北旅行时,至敦煌莫高窟朝圣,向寺中道士求索的。1934年曾在故宫午门上展览过,1936年归方雨楼先生收藏。但何时归入北京图书馆,已无案可查。该叶写本共存文字65行,正面第1~2行用汉字标明:“阿毗达磨俱舍论卷第五世 亲造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分别根本品二之三”。^⑦

①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

② 百济康义“五十二心所を説くウイグル訳アビダルマ論書断片”,《印度學仏教學研究》第26卷2期,1978年,第81~84页;“ウイグル訳アビダルマ論書に見える論師・論書の梵名”,《印度學仏教學研究》第31卷1期,1982年,第112~115(374~371)页。

③ 见其所著“ウイグル訳《阿毗達磨俱舍論》初探——藤井有鄰館所藏断片”,《龍谷大學論集》第425期,1984年,第65~90页;同氏“A Fragment of an Uigur Version of the Abhidharmakosa-Bhāṣya Preserved at the Museum of Fujii Yūrinkan”, TDED xxiv-xxv, 1980-86, pp.305~323。

④ 耿世民“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二),《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50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

⑤ 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图版一。

⑥ 百济康义“天理圖書館藏ウイグル語文獻”,《ヒブリア》第86號,1986年,142~132页。

⑦ 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

(十四)俱舍论实义疏

现存写本一卷,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 Or. 8212—75A/75B(旧编号为 Ch. xix. 001~002),1907 年斯坦因发现于敦煌。为薄纸册子本,共二册。第一册 149 叶(298 面),原写本上用汉字标叶码 1~149。第二册,首尾残缺,81 叶(162 页),原写本上用汉字标叶码 25~105。共计 230 叶(460 面),7015 行,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纸质薄韧,纸幅大小约为 170×132 厘米,每面书 15 行,文中常夹写汉字,边上有用汉字写的叶码。字体为晚期草体回鹘文。据字体,写本属元代,但拼写法基本为古典式的,即一般不见 s 和 z、t 和 d 交替使用的情况。书的原文作者为 5~6 世纪印度著名注释家安慧(Sthiramati)。回鹘文本译者或编者为名叫无念(Asmrta)的法师。所依原文当为汉本。写本的书写人为生于沙州、名叫吐坎儿·铁木耳(Tükäl Tämür)的人。第一个对此写本作初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①由于该写本字迹潦草,加上其文义相当深奥,故研究者不多,直到 1970 年,才由土耳其学者特肯影印刊布了全部写本。^②深入全面的研究也是直到近年才得以完成的。^③

(十五)阿毗达磨顺正理论

回鹘文书名作 Ng(a)yānusāra śāstra,现存 4 叶贝叶式断片。其中三叶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写本原出敦煌,由李盛铎介绍购入。大小分别为 15.3×21.7 厘米和 8.8×11.8 厘米。^④另一叶现存敦煌研究院,为该经之卷十九,内容尚待研究。这几叶写本均用草体回鹘文书写,文中夹写汉字,当据玄奘译本再译。写本似属元代。

此外关于这一内容的册子本写卷又可见于大英图书馆 Or. 8212—75B 之中,计有 271 行,亦由庄垣内正弘刊布。^⑤

(十六)《人阿毗达磨论》注释

关于该经的回鹘文写本现存 7 叶,均出自敦煌,其中 4 叶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3 叶藏羽田明教授处(借原件不知去向,仅留照片),分别为贝叶形式或册子散叶,大小约为 14.8×34.7 厘米和 32.9×21.6 厘米。日本所存 3 叶形式和大小不明。字体分别为回鹘文楷书体和草书体,似分属四个不同写本。回鹘文本当译自现已不传的汉文三卷本

① 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論實義疏”,《白鳥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25 年,第 245~292 页(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第 148~182 页,图版三)。

② S. Tekin, *Abhidharma-kosa-bhāṣya-tikā Tattvarthanama - 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a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ubhandu's Abhidharmakosastra*, New York 1970, xxviii + 231p.

③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語訳・安慧造〈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ウイグル語・ウイグル語文獻の研究》Ⅲ),神戸,1988 年,177p.;同氏《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の研究》Ⅰ~Ⅲ,京都,1991 年。

④ 百濟康義“ウイグル訳〈阿毗達磨順正理論〉抄本”,《仏教学研究》第 38 期,1982 年,第 1~27 页。

⑤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大英圖書館所藏 Or. 8212—75B から”,《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Ⅲ,神戸,1987 年,第 159~207 页。

《入论》的注释书。证明这点的为各处在用汉字书写“论曰”二字后,为引自玄奘译的《入论》原文的回鹘文译文,然后为用汉字书写的“解曰”二字的注释部分的回鹘文译文。此外多处尚写有许多其它汉字。据回鹘文译文,《入论》的作者为塞建地罗(Skandila),注者似为仁护(Mitragupta)。

(十七)《俱舍论颂(Abhidharma-ko śa-kārikā)》疏

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编号为 Or. 8212-108 的敦煌回鹘文残卷中,第 34a(34b 为空白)的内容为对世亲著、玄奘译《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第四品之注释,用词与圆晖《俱舍论疏》卷十三中的有关内容甚为接近。字体潦草,文中夹有汉字。此写本亦由百濟康義率先刊布。^①

(十八)金刚经

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知者有 10 件,其中 1 件(1 叶)藏吐鲁番博物馆,编号为 80. T. B. I. 598,纸幅 20.5×10 厘米,系 1980 年清理柏孜柯里克石窟积沙时发现的。现存文字 8 行,内容属该经《妙行无住品》。^② 另 1 件现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The Gest Library, Princeton),计残片 1 叶,纸质,附彩图,存回鹘文字 13 行。^③ 其余 8 件均见藏于柏林:

1. T II S 53-501(U2073),贝叶式写本,1 叶,双面书写,共存 16 行,面积为 28.5×11 厘米。

2. TM43(U4796),经折叠式木刻本,存 2 大张,双面书字,共存回鹘文 47 行。

3. 编号不详,贝叶式写本,存第 7~15、17、31、32、39、40、47 等叶,计有文字 242 行。

4. T II S 83(U2981),贝叶式写本,存 1 叶,纸幅 35×13.5 厘米,两面共存文字 16 行。

5. T II S 90ff(U2982-2999),贝叶式写本,存 19 叶,有文字 342 行,纸幅 19×15 厘米。

6. T III 84-48(U3144),平装式写本,1 叶,纸幅 15.5×14 厘米,存文字 16 行。

7. T II S 32-6(U1711),贝叶式写本,1 叶,纸幅 41×19 厘米,存文字 56 行。

8. U3601,贝叶式写本,1 叶,纸幅为 14.7×9.7 厘米,双面共存文字 16 行。

以上 8 件抄本后均由哈蔡与茨默研究刊布。在刊布之前,井ノ口泰淳即依据一些残片中的线索,辨认出其译本的依据是敦煌汉文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每品正文之后

① 见其所著“ウイグル訳《俱舍論頌注》一葉”,《印度學仏教學研究》第 28 卷 2 期,1980 年,第 44~48(940~944)页;“A fragment of an Uighur version of the Abhidharma-kośakārikā”, JA, CCLXIX:1/2, 1981, pp. 325~346.

② 多鲁坤·阙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 神戸, 1988 年,第 79~80 页,同氏“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 年第 1 期,第 71~74 页。

③ 照片见刊于 J. O. Bullitt, “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 III, no. 1~2, 1989, p. 18, Fig. 7.

都穿插有偈语。^①该经中的诗句是据汉文翻译的,但议论部分却为回鹘文译者的发挥。茨默考证认为,该经序中与梁武帝答问的“Čiḡoḡ(志公)”实际上就是当时有名的禅师宝志(425~514年)。^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林所藏的回鹘文写本中三次出现有 čiqoḡ šinsī ačari (BTT 1, S. 17. 18. 29. 42), 其中, čiqoḡ 即前述“志公”, 而 šinsī ačari 则不见于该经之汉文原本, 却可见于七克台出土的回鹘文写本《惠远传》^③, 被称作慧远法师之弟子, 而慧远弟子中与 šinsī 音近者仅有僧济一人。^④ 但二者所处的时代相差数十年, 故无法确定僧济、šinsī 与志公间的关系, 附书于此求识者赐教。

(十九)说心性经

回鹘文原作 xin (köngül) tözin uqittači nom bitig, 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 系册子本 Or. 8212-108 中之一部(叶 2a~16b), 存 404 行。纸质细薄, 长 $5\frac{7}{8}$ 吋, 高 $7\frac{3}{4}$ 吋, 字体为回鹘文草体, 但清晰可读。每面写 13~15 行, 拼写法比较规则, 但有时存在 t 和 d、s 和 z 字母交替使用的情况。文中夹写汉字, 似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作者名叫法乘(?)或法藏(?)法师。现存写本的抄写者名叫 Čisuya。这一《说心性经》本没有署明年份。但特肯发现, 此文书的缮写人 Čisuya 同时又是同一写本(Or. 8212-108)中一首哲理诗的作者(即 Čisuya Tutung), 该哲理诗后有一题记曰:“鼠年九月十日, 我于美妙的 T'ydw 之西之 k'w lynqw 来此写讫。”^⑤这里的 T'ydw 即指“大都”, 此名在文献中出现即意味着这一文献为元代遗物, 文献的书写风格与词法特征也正与此合。书中多处引用相当于汉文《首楞严经》和《华严经》的文字。内容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2b/2~6b/2)总论以及心性, 第二部分(6b/2~11b/11)解说关于心性的“三种门”, 第三部分(11b/12~16a/9)关于如何正确理解“三部法”的问题, 第四部分(16a/10~16b/13)为结语。

最早研究此写本的为土耳其学者阿拉特, 他在《古代突厥诗歌》一书的引文中曾多次引用该经的语句。^⑥根据他的未刊译本, 鲁宾从佛教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⑦人们开始对该写本内容有了较多的认识, 但对文书本身的系统论述则是 1976 年由庄垣内正弘先生

① Georg Hazai und Peter Zieme, *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 nebst einem Anhang von T. Inokuchi* (BTT I), Berlin 1971.

② P. Zieme, "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 Texts from Turfan and Tun-huang since 1970",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ol. VI, no. 1, 1983, p. 84.

③ 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文物》1987 年第 5 期, 第 93~94 页。

④ 见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 6,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年, 第 234~235 页。

⑤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p. xix.

⑥ R. R.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 S. 63~161.

⑦ W. Ruben, "Bir Uygur filozofu hakkında, III", *Türk Tarih Kongresi*, Ankara 1948, S. 314~337.

进行的。^① 后来,特肯又刊布了本文书全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和德译,书后附有原写本图版。^②

(二十)妙法莲华经玄赞

唐代法相唯识学大师窥基所撰《妙法莲华经玄赞》(十卷)是一部在西域流行较广的著作,^③ 并被译为藏语和回鹘语。现存敦煌出土写本 1 件,分存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1 叶)和日本羽田亨家中(仅有照片 68 张,原件下落不明),共 35 叶,贝叶式,纸幅为 30.2×14 厘米。纸质硬厚,呈淡褐色,双面书写,每面 8~13 行。系元代回鹘文楷书体写卷。^④ 属于同一写本的还有巴黎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于敦煌携归的回鹘文残卷 7 叶(编号为 Manuscrit Ouïgour No. 63322)。^⑤

此外,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还藏有交河出土的该书回鹘文残片卷子本(编号为 Mainz 732=T II Y21),纸幅 29×21.2 厘米,书草体回鹘文 129 行,1934 年由邦格与葛玛丽刊布,但被误作《法华经》。^⑥ 经百济氏研究,知为《妙法莲华经玄赞》。^⑦ 该写本开首明确记载其所用纸张为“šačio kägda(沙州纸)”,字体较前一写本为古老。

(二十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回鹘文献中关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的写本或印本比较罕见,似与该经所应有的地位不相称。我们仅在敦煌出土的一封回鹘文书信(隐在 P. 4521 册子底封皮里面)中看到一回鹘佛教徒向敦煌某佛教团体索取的回鹘文经典中有该经,回鹘文写作 taypašaki > Tai-po-jā-ching(《大般若经》)^⑧,证明了该经回鹘文译本之存在。据说,在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有册子式的回鹘文《大般若经》译本,但一直未见刊布。

①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 Or. 8212-108 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 57 卷,1~2 號,1976 年,第 017~035(272~254)頁。

②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Teil I: *HSIN Tozin oqıdtaci Nom*, Budapest 1980, S. 17~142.

③ 上山大峻“唐代佛典の西域流傳の一面——《法華玄贊》の出土寫本をめぐって”,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 年,第 455~467 頁。

④ 百濟康義“妙法蓮華經玄贊のウイグル訳斷片”,《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第 185~209 頁。

⑤ 百濟康義“ギメ美術館所藏《妙法蓮華經》ウイグル訳斷片”,《龍谷紀要》第 12 卷 1 號,1990 年,第 1~30 頁。

⑥ W. Bang und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 Berlin 1931, S. 323~356.

⑦ 百濟康義“ウイグル訳《妙法蓮華經玄贊》(1)”,《仏教学研究》第 36 號,1980 年,第 49~65 頁;同氏,“妙法蓮華經玄贊のウイグル訳斷片”,《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1983 年,第 185~207 頁;同氏“Uigurische Fragmente eines Kommentars zum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Der türkische Buddhismus in der japanischen Forschung*, herausg. von J. P. Laut-K. Röhrborn, Wiesbaden 1988, S. 34~55, Fascimiles: 102~106.

⑧ T.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RDTB, No. 40, 1982, pp. 2~6; 杨富学、黄建华译载《敦煌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38~40 頁。

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回鹘文写本 P. 4521 叙述的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关于常啼(萨陀波伦, Sadāprarudita)和法上(昙无竭, Dharmodgata)二菩萨的故事, 与汉文本《放光般若经》之〈萨陀波伦品〉和〈法上品〉内容相似。将之与梵文本《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中之第三十、三十一品相较,^①可以看得出, 回鹘文译本更接近于汉文, 但汉文为散文体, 而回鹘文却为 181 段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 故不是单纯的译作, 而为汉文底本之改编与再创作,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该写本现存 30 叶, 册子形式, 纸幅 25×18 厘米。纸质细薄, 仅封皮为厚纸。叶数用汉字标记, 最后一叶背和后封皮上盖有大型藏文墨印。写本时间、地点、译经人、缮写人均不详。据字体判断, 当属元代写本。其中前一部分(1a~21a, 共 653 行)为此内容, 见刊于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Budapest 1980, Teil II: *Die Geschichte von Sadāprarudita und Dharmodgata Bodhisattva*, S. 151~291; 后一部分(21b~30b)为另一文献, 尚无人研究。

此外, 在回鹘文献中, 我们还可看到一位佚名诗人所撰有关《大般若经》的诗章。^② 龙树所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也由 14 世纪的回鹘译经大师般若失里(Prajñā-śrī)从印度语直接译入回鹘语文。^③

(二十二)《圆觉经》注释本

《圆觉经》, 具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 署唐佛陀多罗译, 疑为汉文撰述。回鹘文译本写卷出自敦煌, 共 4 叶, 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当系贝格曼于甘肃某地所得, 贝叶形式, 纸幅 15.9×34 厘米, 用楷书体写成, 每叶旁都有小字分别标明为 34、54、61、202 等叶码, 日本大谷探险队亦曾于西域某地获印本一叶(编号龙大ウ835), 存 9 行, 纸幅为 13.1×1.7 厘米, 二者均于 1992 年由百济康义作了研究。^④

此外, 还有一件该经的回鹘文木刻本(1 叶), 现存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上书 uluv bulung yingaq sayuqi king alqir tolu tuymaq atir sudur 等文字, 应为此经之回鹘文译名。

(二十三)阿含经

属于《阿含经》的回鹘文写本已发现有多件。其中早为人知的为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中所藏 16 叶敦煌残卷, 应为贝格曼于甘肃某地所得。其中属于《中阿含经》的 8 叶, 贝叶形式, 大小约 15.4×36 厘米。用回鹘文草体写成, 每面约写 13 行, 有时夹写汉字; 属于《杂阿含经》的 3 叶, 贝叶形式, 大小约 13.4×34.5 厘米。用回鹘文草体写成, 每面约写 38~40 行不等。有时夹写汉字。属于《别译杂阿含经》的 4 叶, 形式、大小、字体同上, 也

① A. Yuyama,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m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Cambridge 1976, pp. 118~129)

②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S. 143~150.

③ R.R. Arat, *Eski Türk Siiri*, Nr. 15, S. 154~161; Margit Köves, "A Prajñāpāramitā Hymn in 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 Delhi 1977, pp. 57~67.

④ 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訳《圓覺經》とその注譯”, 《龍谷紀要》第 14 卷 1 號, 1992 年, 第 1~23 页。

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回鹘文写本 P. 4521 叙述的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关于常啼(萨陀波伦, Sadāprarudita)和法上(昙无竭, Dharmodgata)二菩萨的故事, 与汉文本《放光般若经》之〈萨陀波伦品〉和〈法上品〉内容相似。将之与梵文本《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中之第三十、三十一品相较,^①可以看得出, 回鹘文译本更接近于汉文, 但汉文为散文体, 而回鹘文却为 181 段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 故不是单纯的译作, 而为汉文底本之改编与再创作,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该写本现存 30 叶, 册子形式, 纸幅 25×18 厘米。纸质细薄, 仅封皮为厚纸。叶数用汉字标记, 最后一叶背和后封皮上盖有大型藏文墨印。写本时间、地点、译经人、缮写人均不详。据字体判断, 当属元代写本。其中前一部分(1a~21a, 共 653 行)为此内容, 见刊于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Budapest 1980, Teil II: *Die Geschichte von Sadāprarudita und Dharmodgata Bodhisattva*, S. 151~291; 后一部分(21b~30b)为另一文献, 尚无人研究。

此外, 在回鹘文献中, 我们还可看到一位佚名诗人所撰有关《大般若经》的诗章。^② 龙树所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也由 14 世纪的回鹘译经大师般若失里(Prajñā-śrī)从印度语直接译入回鹘语文。^③

(二十二)《圆觉经》注释本

《圆觉经》, 具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 署唐佛陀多罗译, 疑为汉文撰述。回鹘文译本写卷出自敦煌, 共 4 叶, 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当系贝格曼于甘肃某地所得, 贝叶形式, 纸幅 15.9×34 厘米, 用楷书体写成, 每叶旁都有小字分别标明为 34、54、61、202 等叶码, 日本大谷探险队亦曾于西域某地获印本一叶(编号龙大ウ835), 存 9 行, 纸幅为 13.1×1.7 厘米, 二者均于 1992 年由百济康义作了研究。^④

此外, 还有一件该经的回鹘文木刻本(1 叶), 现存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上书 uluv bulung yingaq sayuqi king alqir tolu tuymaq atir sudur 等文字, 应为此经之回鹘文译名。

(二十三)阿含经

属于《阿含经》的回鹘文写本已发现有多件。其中早为人知的为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中所藏 16 叶敦煌残卷, 应为贝格曼于甘肃某地所得。其中属于《中阿含经》的 8 叶, 贝叶形式, 大小约 15.4×36 厘米。用回鹘文草体写成, 每面约写 13 行, 有时夹写汉字; 属于《杂阿含经》的 3 叶, 贝叶形式, 大小约 13.4×34.5 厘米。用回鹘文草体写成, 每面约写 38~40 行不等。有时夹写汉字。属于《别译杂阿含经》的 4 叶, 形式、大小、字体同上, 也

① A. Yuyama,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m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Cambridge 1976, pp. 118~129)

②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S. 143~150.

③ R.R. Arat, *Eski Türk Siiri*, Nr. 15, S. 154~161; Margit Köves, "A Prajñāpāramitā Hymn in 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 Delhi 1977, pp. 57~67.

④ 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訳《圓覺經》とその注譯”, 《龍谷紀要》第 14 卷 1 號, 1992 年, 第 1~23 页。